



王珏 著

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

譯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书获得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级项目“学术著作出版专项”的资助

王珏 著

林语堂
英文译创研究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首先以译创者主体性研究为起点,将林语堂界定为译创者,分析其在双重身份作用之下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和译创思想方面的主体性行为。其次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指出其译创手段的复杂性以及同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最后从海外出版情况和读者评论两个层面分析其英文作品的传播和接受情况,指出林语堂本人及其作品的国际影响力,揭示其译创动机的完成和译创手段的实现。通过以上三个维度的深入分析,全面、客观地在历史语境中审视译创者和译创文本,并归纳林语堂的主体行为和译创模式对文化输出的价值与借鉴意义。

本书读者对象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群体,如高校教师、在校研究生、林语堂研究人员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 / 王珏著.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313-21790-5

I. ①林… II. ①王… III. ①林语堂(1895—1976)文学翻译—研究 IV. ①I206.7②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69038 号

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

著 者: 王 珏

出版发行: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 200030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书 号: ISBN 978-7-313-21790-5/I

定 价: 68.00 元

地 址: 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 021-640712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 12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 读 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 025-83657309

序 言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传播中华文化与文学,翻译界和出版界在中国文学与典籍的译介上做了很多努力,先后出版了外语版文学期刊《中国文学》、系列出版物“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等。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综合国力日益增强,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西方社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愿望也日益强烈。2012年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更是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学外译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汉籍外译研究也成为国内译界的研究热点,出版、发表了许多高质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博士论文,对汉籍外译的译者、选材、策略、接受情况等诸多问题展开了有意义的探索。王珏博士的《林语堂英文译创研究》,就是其中一部富有理论开拓精神和实践参考价值的著作。

作为中国现代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林语堂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双语作家的身份译创双语作品,又以其英文译创享誉世界,为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熟谙中西两种文化,对翻译理论的思考以及使用的翻译策略也独具匠心。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外一系列旨在“重新发现”和“历史评价”林语堂的学术活动的开展,作为作家的林语堂的价值已经得到了肯定,但作为翻译家的林语堂的地位与贡献却还未得到充分的挖掘。虽然研究者众多,成果丰富,但研究重点多聚焦于个别作品的翻译策略和译本分析等微观层面,缺乏对其英文作品的整体观照和宏观考察。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本书作者的研究选题具有重要价值,既丰富和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内容与范围,又为中国文



学和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我认为本书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有以下几大特色。

第一,译创理论的视角。翻译研究在经历了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两次大的转向之后,近年来又出现了“创造性转向”这一新趋势。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定义。相应地,译者研究也转向关注译者作为“创造者”和“作者”的身份,分析译者在“写作”译文时的创造性改写。译创理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由印度和巴西学者分别提出,在翻译的创造性转向这一新趋势出现之后,该理论又受到了欧美翻译学者以及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关注,将其从一种翻译理论进一步拓展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理论。本书对译创理论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对其适用性作了探讨和论证。作者首次将该理论运用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研究中,将林语堂定义为“译创者”,将其大部分英文作品定义为“译创文本”。由此,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研究就可以从整体上加以观照,避免因为创作和翻译分离而导致研究结果失之偏颇。

第二,深入的文本研究。林语堂作为翻译家的地位和贡献并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其主要原因既有因海外文献获取不便造成的集中于单个作品的研究,也有传统翻译观和翻译研究方法导致对其翻译思想和策略的片面认识。本书在这两个方面均有所突破。作者搜集到林语堂20多部英文译创文本,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初版作品,另外搜集到许多林语堂早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及文章、林语堂传记、林语堂研究专著等,这为她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依据大量的文献或史料,作者对林语堂的译创动机、文本选择、译创思想以及译创手段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评价,力图再现林语堂在翻译选材和翻译策略上的主体行为及其背后的复杂因素,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林语堂英文译创活动的真实面貌。

第三,接受效果的调查。林语堂英文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一直是林语堂翻译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书在这方面也有所建树。作者对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海外出版数据作了汇总,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详细考察了其作品在非英语国家出版的情况,从而揭示了其作品在世界范围内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使研究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同时,作者对读者接受情况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分析读者群体对其语言风格、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手段等方面的评论。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全面分析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读者接受情况,探讨其背后的原因。这既是对前面林语堂译创主体和译创手段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也填补了林语堂翻译研究的学术空白。

第四,现实意义的挖掘。作者除了着力研究译者主体行为、翻译策略和接受效果之外,还在相应各章分别总结了林语堂作为译创主体的贡献和价值、林语堂译创手段的贡献和价值以及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实启示。这使本书除了学术价值之外,又有了重要的应用价值。从前人的实践中,我们可以提取出对文

化输出战略有益的宝贵经验,这既是学术研究自身不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汉籍外译研究的重要现实目标。因此,对林语堂翻译的研究,除了学术价值上的考量之外,更应关注其现实价值。从这一点上说,林语堂在文本选择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译创手段上的丰富性和灵活性,以及从中展现出来的多元文化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在作者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论述充分、求证严谨,而且行文流畅、格式规范,表现出作者相当强的学术研究能力,赢得了不少专家的一致好评。作为王珏的导师,我见证了她的选题、收集资料、论文撰写到不断修改的整个过程,也见证了她在此过程中经历的种种艰辛与磨砺。在这部著作即将付梓之际,我由衷地为她感到欣慰,希望她继续沿着学术研究的道路,砥砺前行,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张春柏

2019年7月

于华东师范大学

目 次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4
1.2 研究意义	5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7
1.4 研究方法	8
1.5 研究框架	9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11
2.1 译创理论概述	13
2.1.1 译创理论的提出和发展	13
2.1.2 译创理论的内涵分析	14
2.1.3 译创者主体性分析	18
2.1.4 译创手段分析	23
2.1.5 对译创理论的批评	25
2.1.6 译创理论在国内的介绍及其现实意义	26
2.2 林语堂研究述评	28
2.2.1 中国大陆的林语堂研究述评	28
2.2.2 港台地区及海外林语堂研究述评	31
2.2.3 林语堂研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32
2.3 本章小结	33
第 3 章 林语堂译创动机、内容和思想研究	35
3.1 林语堂译创动机分析	37
3.1.1 赛珍珠的发现和《吾国与吾民》的畅销	38
3.1.2 纠正此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误读	39



3.1.3 调和中西文化,构建多元文化	40
3.1.4 从个人兴趣与视角出发讲述中国故事	40
3.2 林语堂译创内容分析	42
3.2.1 经典哲学	42
3.2.2 抒情哲学	44
3.2.3 影响译创内容的因素分析	45
3.3 林语堂译创思想分析	49
3.3.1 宏观视角	50
3.3.2 微观视角	55
3.4 林语堂作为译创主体的贡献和价值分析	61
3.5 本章小结	63
第4章 林语堂译创手段研究	65
4.1 语言视角下的译创手段分析	67
4.1.1 正文本文层面	67
4.1.2 副文本层面	83
4.1.3 互文本层面	89
4.2 文化视角下的译创手段分析	102
4.2.1 中国文化的内部层面	103
4.2.2 中西文化的外部层面	108
4.3 林语堂译创手段的贡献和价值分析	110
4.4 本章小结	114
第5章 林语堂译创效果研究及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115
5.1 林语堂译创作品海外出版情况分析	117
5.2 林语堂译创作品读者接受情况分析	131
5.2.1 期刊和报纸上发表的书评文章	131
5.2.2 网络上发表的读者评论	135
5.3 林语堂译创效果的原因分析	138
5.3.1 西方文化语境的需要	138
5.3.2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需要	138
5.3.3 赛珍珠夫妇的作用	139
5.4 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140
5.5 本章小结	143

第 6 章 研究结论	145
6.1 本书研究成果	147
6.2 本书的创新之处	151
6.3 本书的局限	151
参考文献	153
附录 1:林语堂作品总目	170
附录 2:林语堂生平年表	173
后记	180
索引	182



绪论

第1章

林语堂(1895~1976)是20世纪享誉国际的作家、翻译家、学者,更是中国文化海外输出的杰出代表。他用英语创作和翻译的一系列作品曾经享誉欧美文坛,有的被选为美国大学的指定参考书(余英时,2006:466),有的成为政府官员了解中国的必读文本(施建伟,1999:682)。林语堂在中美两国的生活与写作经历,一方面为他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并赢得了国际文坛的巨匠地位,另一方面又使他在中美两国的接受与认同呈现出巨大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以降,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林语堂再次进入学者和公众的视野。首先是林语堂作品的大规模出版。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和群言出版社分别于1994年、2003~2005年和2011年出版了林语堂全集,涵盖了林语堂的大部分中文和英文作品(汉译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分别于1998年、1999年、2005年和2009年首次出版了林语堂原版英文著作,收录了十余部颇具影响力的英文作品。其次,国内的研究者们(如万平近,1987;王兆胜,2007)开始重新定义林语堂,客观地反思其在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价值与地位。30年来,林语堂研究在国内得到了长足发展,推出了一大批有价值的学术专著、学术论文以及学位论文,在质量与数量上均超过了此前数十年的研究成果。2007年12月,漳州师范学院以“走近林语堂”为中心议题,举办了首届“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从多层面、多角度对林语堂进行了深入研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012年10月,漳州师范学院在此前会议基础上,又召开了以“语堂世界,世界语堂”为主题的“林语堂两岸学术研讨会”,标志着林语堂研究进入一个繁荣时代。



1.1 研究背景

纵观近年来的研究成果(本书将于第2章“2.2 林语堂研究述评”一节里作具体分析),虽然视角多种多样,有一个问题却并未得到解决,即所有的研究都是将其英文作品分为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两个部分来分析。现当代文学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学者(如王兆胜,2007;陈千里,2013)大多囿于语言局限,只研究创作文本,确切地说是研究林语堂英文作品的汉译本。外语研究领域的学者直接从原著入手,有些学者(如陆洋,2005;黎土旺,2007)只研究翻译文本,针对个别传统意义上的译作或者择取其创作文本中带有翻译性质的部分进行微观考量;还有些学者(如王少娣,2011;冯智强,2011)虽然对其英文作品进行整体观照,但是仅仅讨论了林语堂的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对林语堂翻译和创作杂合的文本关注不够。这些翻译和创作杂合的作品,本来是林语堂英文作品的主体构成,却并没有引起翻译学者的重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界一直将其作为原创作品来看待。如果是原创作品,自然不会从翻译研究的角度来分析,但是又无法回避其中包含的大量翻译现象这个事实,因此,就出现了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创作和翻译分开讨论的情况。

引入“译创”(transcreation)理论之后,对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了。译创这一概念是由印度诗人兼翻译家普鲁肖塔玛·拉尔(Purushottama Lal)和巴西诗人兼翻译家阿洛多·德·坎波斯(Haroldo de Campos)分别于1957年和1969年提出,二者都用了“transcreation”这一术语,即“translation + creation”来表达一种翻译和创作并存的写作方式(本书将于第2章“2.1 译创理论概述”一节里展开详细讨论)。从这个视角来观照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翻译文本,如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浮生六记》)(1939b)^①、*The Chuang Tzu* (《英译庄子》)(1957)等,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创作文本,如 *The Birth of a New China: A Personal 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新中国的诞生:中日战争之我见》)(1939c)、*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 (《八十自叙》)(1975)等。这两类作品只占了一小部分,而他的大部分英文作品则是融合了翻译、编辑、解释、改写、创作等多种书写形式于一体。有“编辑+解释”式翻译的作品,如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的智慧》)(1938)、*The Wisdom of Laotse* (《老子的智慧》)(1948)、*The Importance of Understanding* (《古文小品译英》)(1960)等;有对原文本进行改

① 该书最早连载于1935年 *Ti'en Hsia Monthly* (《天下月刊》)第1—4期,后经修订,由上海西风社于1939年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林太乙的《林语堂传》(1989)一书结尾部分“林语堂中英文著作及翻译作品总目”里,将此书列为1939年西风社出版。因此,此书的出版时间据此沿用1939年。

编的作品,如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 (《英译重编传奇小说》)(1951a);还有在自译基础上的改写,如 *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英文小品甲乙集》)(1935b)、*With Love and Irony* (《讽颂集》)(1940)、*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1943)等;更有在翻译基础上的创作,如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吾国与吾民》)(1935a)、*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艺术》)(1937)、*Moment in Peking* (《京华烟云》)(1939a)、*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苏东坡传》)(1947)等作品,其间隐含和夹杂着大量的翻译现象。引入译创理论之后,林语堂英文作品的界定就非常明确了,除前两类少数作品之外,其大部分英文作品都属于第三类——即译创文本。由此,对其英文作品的研究就可以从整体上来观照,也不会因为创作和翻译分离而导致研究结果失之偏颇。

综上所述,本书将从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活动出发^①,对其译创动机、译创内容、译创思想、译创手段以及译创效果展开全面的研究。通过分析林语堂的主体性行为与译创手段,对其译创实践进行一次新的探索。这样既可以寻求跨学科的研究视角来丰富和完善翻译研究的内容与方法,又可以将林语堂翻译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语境之中,探讨其对翻译学、文学理论以及文化研究的价值与启示。

1.2 研究意义

本研究的意义首先在于首次将译创理论运用于林语堂英文研究中。如 1.1 所述,此前的林语堂英文研究一直集中在少数创作文本和翻译文本上,而其作品的主体构成部分——译创文本则明显研究不足。究其原因,恐怕是囿于原文/译文二分法以及追求“等值”(费道罗夫,1955:156)的认识论,即必须先有一个固定的原文在场,才有译文的存在,且二者要在很大程度上等值。以这样的翻译理念来反观林语堂的大部分英文作品,自然无法将其纳入翻译研究的范畴,形成了研究的灰色地带,使得该领域的研究无法系统和全面地展开。引入译创这一概念,则可以首先对其英文作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而进一步研究其文本中所体现的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其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下的具体实现。这为解读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开辟了新道路,也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空间。

其次,对林语堂本人的研究,也多了一个新视角——作为“译创者”(transcreator)(Lal,1957)的林语堂。译创者与译者的不同在于,在译者身份尚在由隐身到现身的讨论之际,译创者从一开始就彰显了自己作为作者而不只是译者

① 在具体的讨论中,笔者会以译创文本为主,但对其他两个分类下的文本依讨论的内容也会有所涉及,互为观照。



的身份。比如,坎波斯的作品 *Deus e 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 (《歌德〈浮士德〉中的上帝和魔鬼》)(1981)是对《浮士德》的创造性翻译,同时又加入了译者对原文的评论、对译文的辩护以及对食人主义翻译理论的阐述。但是,在此书的封面上,坎波斯的名字是作为唯一作者而不是译者出现的。同样,在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作品中,我们也能在前言、后记或者正文部分中看到其本人对于翻译所作的一些辩护和解释,但林语堂都是作为唯一作者出现在封面或内页上的。这种作者身份的彰显体现了译创者的一个态度,即作品不是作为对原作思想和形式的复制,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参与,面对一种特定文化下的特定读者所制作的文本(Gentzler, 2008: 86)。研究译创者林语堂,就是从作者的角度看待译者,认可译者对于文本的创造性贡献,对于作者、译者的定义,以及作者和译者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

本书的第三点意义在于对翻译理论研究中出现的新动向的一次积极的探索。众所周知,翻译研究经历了两次大的转向,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的语言学转向和20世纪70年代起的文化转向。在文化研究的范式之下,翻译研究的重点从作者转向译者和读者,从源语文化转向目的语文化,对译者的地位与作用也有了新的认识。沿着这一研究脉络,学者帕斯卡利斯·尼克劳尔(Paschalis Nikolaou)提出了新的术语:翻译研究的“创造性转向”(creative turn)(Nikolaou, 2006: 19)。所谓创造性转向,是指文学翻译作为一种改写,其内在的创造性以及在改写中译者的思维过程都是非常重要的,翻译正作为一种“写作”形式(as a form of “writing”),按照其创造性的特征被重新思考和重新定义(Loffredo & Perteghella, 2006: 2)。雪莉·西蒙(Sherry Simon)也从创造性这一角度给翻译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翻译是一种写作,这种写作是在创造性的影响下,通过与其他语言的交流获得启发而产生的文字”(Simon, 2006: 17)。相应地,对译者的研究也转向关注译者作为“创造者”和“作者”的身份,分析译者在“写作”译文时的创造性改写(Bassnett, 2006; Buffagni, 2011)。不难看出,翻译研究中所出现的创造性转向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而是对“翻译是(再)创造”这一历史命题的重新发现和补充,也是对文化转向的延续和发展。对林语堂英文译创的研究正是对翻译研究中出现的这种创造性转向的一次尝试和探索。通过考察林语堂作品中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关系,以及林语堂作为创造主体的译创者身份,从创造性写作的角度对翻译、文本(原作、译作和译创)、翻译主体(作者、译者和译创者)这些概念有一个新的认识和思考。

最后,本书为探讨中国文学和文化输出这一课题提供了一个参考范例,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首先,林语堂的英文译创中始终体现着传播中国文化这一译创动机,并在此基础之上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其次,林语堂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多种译创手段如编译、自译、注译、译写等,成功地传播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化。最

后,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在英语世界广为流传和接受,这既有译创者本人在写作过程中对于可读性的考虑,也有传播媒介——出版商的出谋划策。因此,对其译创效果的研究也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有效输出、异质文化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

1.3 研究目的与内容

本书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译创主体研究。考察林语堂的译创动机、译创内容以及译创思想,分析其译创者身份和社会语境对其译创动机的影响,其译创内容与译创动机的内在一致性,以及在译创思想中所体现的译创者主体性。

第二,译创手段研究。通过对林语堂英文译创文本的全面考察,分析其在译创中国文化的具体内容里各种译创手段的综合运用,从而探究其创造性翻译和翻译式写作两种译创模式是如何展开的。

第三,译创效果研究。对林语堂作品海外传播情况和接受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其背后的原因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启示。

与之相对应,本书的具体内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第一,对林语堂译创动机、译创内容及译创思想展开研究。首先,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动机。赛珍珠(Pearl S.Buck)对林语堂的发现和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1935a)一书的成功出版,使林语堂走上了向外传播中国文化的道路。这里一方面将探究林语堂如何出于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多元文化意识,纠正此前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化的误读与偏见,为展示真实的我者形象、调和中西文化作出努力;另一方面将探究作为译创者的林语堂,如何在双重身份的作用下,出于个人兴趣与视角重构中国文化。从民族责任心和自我实现两个角度分析文化语境和译创者主体之间的对话与抗衡,以及其译创者身份对译创动机的影响。接着,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内容。林语堂的英文译创文本超过三十部,写作时间跨越数十年,涉及传记、小说、随笔、论述等多种体裁,选材非常广泛。在文献调查的基础上,本书将对其译创内容进行总结归纳,同时将对影响其译创内容的因素从译创者本人、读者以及赞助人等方面展开分析,从而尽力还原历史现场,将林语堂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语境之下,揭示其译创内容及成因。最后,本书将分析林语堂的译创思想,为其译创行为寻找理论依据。以往对林语堂翻译思想的研究多为对其翻译标准进行解读,林语堂散落在其著作和文章中的其他重要观点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因此,本书将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其中英文著作、文章以及演讲稿中散落的译创思想进行文献调查,重点考察其英文作品的前言、导言、导



读以及评注部分中的译创思想,同时还要对其语言观、文学观以及文化观进行综合解读,从而揭示其译创思想的真实面貌。

第二,对林语堂的译创手段进行系统探讨。由于译创兼具翻译和创作两种表达方式,因此在手段上结合了翻译策略和创作手法,比传统的翻译手段更为复杂、自由和多样。鉴于此,本书将从语言和文化两个视角,运用文本对比与分析的方法,对林语堂的译创手段展开系统、深入的研究。具体来说,在语言视角下,本书首先将对正文本层面下的词语、句子和风格展开分析,考察林语堂对“文化专项词”(cultural-specific items)(Aixela, 2007: 58)的翻译,对句子结构、句子顺序以及句子节奏等方面的处理,探讨词语和句子相结合所形成的语言特征,同时讨论林语堂的语言风格和对冗余信息的有效利用。其次将对副文本层面进行调查,分析林语堂对各类副文本因素如前言、导言、注释、插图、附录等的灵活运用,分析副文本对正文本的引导作用。最后将对互文本层面展开讨论,考察林语堂译创文本中对引用、暗示、戏拟、仿作、自译、改编等各种手段的交叉运用。在文化视角下,本书将借鉴对话理论和形象学理论的相关观点,从更宏观的角度探究林语堂如何向外进行文化输出,努力打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为中国文化在西方话语霸权下争取一席之地。通过以上两个视角点、线、面结合地勾勒出林语堂的译创手段体系后,本书将试图归纳出其译创手段的总体特征,并探讨与译创动机和译创思想之间的关联性,对其贡献与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第三,对林语堂译创活动的效果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进行分析。德国文艺理论家汉斯·姚斯(Hans Jauss)指出,在作者、作品和大众之间,大众并不是被动的,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收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1987: 24)。因此,对林语堂译创作品的海外传播与接受情况也将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领域,同时,对译创效果的研究也是对译创主体和译创手段研究的进一步完善和补充。在定量研究的基础上,本书将首先对其译创作品的海外出版数据进行汇总,以揭示其作品在国际范围内跨时间跨地域的影响。而后,将对其读者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读者群体对其语言风格、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手段等方面的评论。从历时和共时两个角度,考察其作品的海外传播与读者接受情况,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并分析其译创活动对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启示。

1.4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如下。

(1) 文献调查法。搜集国内外出版的林语堂英文译创作品及相关文献,尽可